

「國語」生成研究

——一個文學史的分析

呂 昭 明

【本文提要】

「國語」是什麼？過去學者們多是就理論，以及推想測知的方向上做說明。在本文中，筆者嘗試由現代文學史的角度來做思考，認為胡適先生在民初新文學運動萌芽之始，所揭舉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這個旗幟般的口號，對於國語的生成、發展，有一關鍵性的影響力^①。文末亦提出吸收心理語言學、社會語言學和方言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以促進更深微的探究。

一、前 言

在早期談論語法的書籍裡，大都對國語隻字未提。而談到國語的，多數僅停留在泛談空議什麼是語言的問題上，或是依音韻學界的定義，重複反述^②。遂使得「國語」在

① 必須指出的是，仍然有許多複雜的因素，雜揉在這個政治的主張下，進而帶動國語的成長。諸如：時代的社會背景(文學運動風氣)、民衆教育程度，以及書報雜誌流通情形……等等。

② 在早期的語法學研究中，對於「國語」(現代漢語)的定義，多只停留在推測的層次上。譬如：

(1) 在何容《中國文法論》，首頁就是談「國語的成份和表意的方法」。然而檢閱之後，卻不免有所失望。因為其言「語言的成份」和中國文法，兩者有什麼樣的關係？何氏並未說明。只就表意的方法多所著墨。

(2) 高名凱《高等國文法》：「……我國語之緣起，有五端：一緣同一聲類而起。二緣反訓而起。三緣音之長短起種種之語意。四緣懸疑而起。五緣類推而起。」

時代旅程中，本身發展以及受到外來的影響，種種語言現象的陳述，顯得複雜而毫無頭緒。相對的，許多問題也就一直處於糾結的狀態^③。

以下，筆者歸納幾位音韻學者們以及語言學研究者對國語的解釋、定義等等看法，以利於進一步的思考。

(一)在音韻學者方面，對國語的定義，主要依官話系統、民族共同語，做為整個思路的出發點。就此我們引舉幾位先生的說法：

1.董同龢：「所謂『國語』，就是現代中國的標準語，它是以北平受過相當教育的人的語言為基礎的。幾百年來，中國社會上的領導人物都以北平為活動的中心，並且曾用

上文所述，乃國語之緣起也。至於國語之發展，大抵以複合詞之增加為主。」就高氏所言五點來說，也看不出其間的關聯性，而和國語之緣起則更顯得格格不入。

(3)黎錦熙《國語文法》：「向來學習國語的，大都拿北平話作標準；民國二十一年五月，教育部公布《國音常用字彙》，便正式指定北平的語音為國語拼音和聲調的標準。其實國語乃是區域最廣，流傳最久，通行於現代有知識的社會，而又能隨時改進的普通話(舊稱官話)。」黎氏的說法中，何謂「隨時改進」，實在得多加思考。

③ (1)譬如：魏岫明《國語演變之研究》：「……自馬氏文通(西元 1898 年)至今也不過八十年。早期大部份的漢語語法著作，都只在討論詞類的問題上打轉，並未真正觸及語法核心問題。近年來嚴格的採用結構學派或者更新的變換學派理論來研究國語語法的則是才剛剛起步。國語語法領域是亟待開發研究的。正因為語法研究的方興未艾，在此處討論語法的演變情形也就相當困難。最主要的問題是漢語語法的原本情形，我們還不是十分清楚，更難論及它的演變了。」最近幾年，中國大陸的學者，對古代漢語語法的研究已取得不錯的成績。然而魏氏的問題，則是國語研究上，以往學者忽略對漢語語言現象的關注，所導致的基本問題。

(2)如呂叔湘先生近年言及漢語語法研究所遭遇的三方面問題時，說道：「……現代漢語的口語和書面語的異同問題。書面語以最嚴肅的到最活潑的是一個連續體；同樣，口語也有莊重到隨便的分別，也是一個連續體。二者有重合的部份，又有各自獨立的部份。講現代漢語該拿什麼做論述的對象？只講重合的部份，不講獨立的部份？或者籠而統之不加分別。」見龔千炎《中國語法學史》，大陸，語文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原版呂序。

活的語言寫出許多文學作品，所以他們的語言早就成為約定俗成的『官話』了。『國語』則不過是民國以後政府頒行的名詞。」^④

董先生站在北平話的角度，以國語乃約定俗成的官話。

2. 謝雲飛：「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每個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語言，漢語只是其中一種語言而已。就以漢語來說，雖然所用的文字是統一的，但各地方在語音上的差別卻是十分之大，……語言的環境既是如此，則要求在諸般方言之中提出一種來，定以為標準國語，是十分有必要的，現行的國語就是因此定出來的。」^⑤

謝先生視國語是由諸多方言中提取而出的標準國語。^⑥

3. 竺家寧：「國語是自然形成的全民語。這個自然的全民語為什麼以北方官話做基礎呢？這是有它必然的原因的。第一、北方官話使用的人口最多，通行的區域最廣。……第二、北方音的語音系統簡單易學。……第三、北方一直是中國的政治中心。……第四、明清以來盛行的白話小說往往都是依據北方語言寫的。……在上述四點的交織的因素下，國語的形成，自然而然就以北方音做基礎了。」^⑦

竺先生的說法則較董、謝兩先生來的全面。只是這些先生們關注的主題並不在此，是以所論則無較細節的說明。於此並可以看出諸家的說法，是一通泛、概括性論述。其實，這種由語音層面為出發點，做逐步推移思考的方式，就國語發展的內在理路而言，不但有其一定的理論依據，亦能由其中獲得合理的詮釋。而讓筆者困惑的是，如果單是藉由語音層次，即要對整個國語語言現象，做出通盤的瞭解，則可能已陷入語言發展的「自然過程」與「歷史過程」混淆的困境，因為這樣的理解恐怕是個別而孤立的。我們都知道語言的生成、發展皆有其極複雜的因素存在，從語言的表層形式看來，由語音來探討一種語言的源頭才能有正確的認識。然而深入語言的整體面，卻發現這樣的思索方

④ 見《漢語音韻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10月，初版十四刷。筆者以為，這個看法只是表層現象，幾百年來，北平話無論詞彙、音韻、語法亦有變化。

⑤ 這個看法，又顯然對於明代以來的移民問題，以及北京音系的形成問題，缺乏合理的認識。見《中國聲韻學大綱》，臺北，學生書局，1987年10月，初版。

⑥ 趙元任先生亦言：「標準語是大眾公認——一方面當然是比較要超過半數，即使不超過半數，也要很多很多人已經聽得懂，已經多少會用的語言。所以近幾百年——元、明、清、民國——以來，總是以北方，多少以近乎北平音的系統，認為是標準音。」（見《語言問題》p.96，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11月，初版6刷。）

⑦ 然而「北方話」的範圍太大，就細節問題而言，也有繼續探討的空間。《聲韻學》，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5年11月，2版3刷。

向是不足的，因為缺乏了歷史過程的考察、關照，將使得對於國語語言現象的推論，無法落實於具體的分析中。換言之，自然生成的說法，誠然也是一種解釋，筆者則以為必須再將語言現象放入歷史過程的脈絡中，才可能有一更為清晰的觀測點。

必須指出的是，儘管由音韻學的觀點，並未能有效的解決國語語言現象發展的問題。可是由此角度開展出的思考模式，卻深深地影響著許多研究語言學的學者。我們可以看到下面一點。

(二)關於語言學研究者對國語的詮釋，即很明顯可以感受到，從北平語音的認知，切入解析國語的問題上。譬如：

1. 湯廷池：「今日做為中華民族共通語的國語，……據我個人的了解，當初制定國語的時候，固然以北平語音為標準音，並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可是並沒有包羅北平話中所有的土話(俚語)或黑話(隱語)在內，而且也接受了後來白話文學對於國語的貢獻，甚至還吸收了其他方言中有用的成份，成為一種能順應時代要求的富有表達力的語言」^⑧。

2. 黃宣範：「國語本來就不是一種自然發展出來的語言。……基本上，當初訂定的國語，不但不是北平的讀音(但可以說是以北平地區受到相當教育的人，日常說話的口音為準)。語彙方面，也拋棄了許多北平地區特有的土語及歇後語，吸收了許多來自其他方言的詞彙和外來語等等，才有我們今天所熟悉的國語。」^⑨

在 1、2 點中，湯、黃兩先生將國語探討的層次，擴大開來。且先由北平話談起(同樣都注意到北平音的問題)，並提出白話文學、方言、外來語等對國語成份可能的影響。可說是較過去學者嚴謹。只是這樣的說法，還是停留在合理的推斷範圍內。對於國語的源流、及其發展的可能路線，仍然沒有做出適宜交待。

3. 由陳新雄等先生所編著《語言學辭典》對於國語的定義：「『國語』(Mandarin : National language)，我國的法定語言……是以北平話為基礎，經由不同方言的人，薈

⑧ 湯廷池：《國語語法研究論集》，臺北，學生書局，1996年10月，初版5刷，p.58。

⑨ 黃宣範：《語言學論叢》，臺北，黎明出版社，1974年，p.118。其實如果我們仔細追問，為什麼會「吸收了來自其他方言的詞彙」時，同樣會推擠出許多問題，如北京音系是如何形成？為什麼官話的所佔面積在整個方言地圖中，有如此大的區域？北方話如同前面幾位先生敘述的簡單概況所形成的嗎？歷史背景的層疊情況為何？人口遷徙所造成的語言影響，又是什麼樣的情況？這些零雜的問題，都有待我們進一步的探索與研究。

萃在一起。互相融合，不知不覺，去泰去甚，選擇出最方便容易的聲音，鍛鍊成最簡單明瞭的組織，這樣形成的。所以，北平話並不完全等於國語。」^⑩

不過我們想追問的倒是，在自然發展、約定俗成的過程中，國語是否真的只是「互相融合，不知不覺，去泰去甚，選擇出最方便的聲音，鍛鍊成最簡單明瞭的組織」如此簡潔而帶有感性的解析？

以上三點的區別，實多已觸及到了國語生成、發展的種種環節，可說是各有其根據。論其整體，卻顯得零星不完備。深究這當中的原因，最主要的還是在於沒有把「自然過程」和「歷史過程」結合成一有機體的研究。

合整上面的討論，約略可看出相關於國語生成、發展的問題，前輩學者亦多未重視。然而今日，必須體認到一點，即是外國語言學的進駐，標誌著新的思維和不同視角的研究方法，在影響著傳統語言研究。所以我們更應該重視語言現象的研究，不應當只是片面的尋求形式上的模仿、借用。或許對整個漢語研究本身而言才會有所助益。以往語法研究的先輩們，被批評為「套用」、「削足適履」，正是忽略了這一層面的關注。而如何釐清國語在「自然過程」和「歷史過程」發展的關係，則是本文撰作時所思考的基點。（為了避免理解上的混淆，對於大陸在「普通話」所下的定義，和「國語」於臺灣發展、變化的情形，本文將不做討論。^⑪）

二、本 論

要探討「國語」，必須藉由現代文學史的流程來看。最主要的因素在於一場「文學革命」（歷史家稱之為「中國的文藝復興」）^⑫，激起了整個新文學運動。而整個新文學的成長茁壯，與國語當中的語言成份，又有極為密切的關聯。

司馬長風：「文學革命的正式起步，是一九一七年一月《新青年》刊出胡適〈文學改良芻議〉那篇文章。這篇文章不但是文學革命的號角，同時也是綱領^⑬。」周有光：「文

^⑩ 參見其書，臺北，三民書局，1989年，10月，初版。

^⑪ 有關國語在臺灣的演變狀況，可參考羅肇錦先生：《國語學》一書。（參考書目14）和黃宣範先生：《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臺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臺北，文鶴出版公司，1995年7月，第1版。

^⑫ 周有光：《中國語文的時代演進》，大陸，清華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⑬ 見司馬長風著《中國新文學史》，臺北，駱駝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p.29。

學革命的揭幕人是胡適(1891~1962)^⑭。」這兩段話，異口同聲地引領出，當年文學革命的揭竿人物——胡適。只是兩位先生的視角，是由整個現代文學史的脈動所下的論斷。單就國語論之，則有其問題^⑮。以下三段史料，筆者以為是過去大家忽略亦未多留意，即關於胡適當年對於國語的倡議及意見^⑯（這幾篇文章，寫作年代介於 1918~1922 年間，提倡國語的中心思想，亦已明顯的呈露出來）。

1.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若要造國語，先須造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國語。……所以，我以我們提倡新文學的人，儘可不必問今日中國有無標準國語。我們儘可努力去做白話的文學。我們可儘量採用水滸、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的白話。有不合今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話來補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來補助。這樣做去，決不愁語言文字不夠用。也決不用愁，沒有標準白話。中國將來的文學用的白話，就是將來中國的標準國語。」

文言與白話的混用，是建立在同是漢語的基礎上。於此，雖然只是口號式的主張，卻可由清末的文言翻譯，看出端倪（詳後）。此處，胡先生最主要還是希望國語是與中國現代文學相契合來發展的路線上頭。

2. 〈國語與國語文法〉：

「什麼是國語？……『國語』這兩個字很容易誤解。嚴格說來，現在所謂國語還只是一種儘先補用的候補國語；不是現任的國語，……一切方言都是候補的國語，但必須先有兩種資格才能夠變成正式的國語：第一，這一種方言，在各種方言之中，通行最廣。

⑭ 同註⑫。

⑮ 問題在於〈芻議〉是就「文學改良」的角度所下的論述。真正對國語整體發展具有深刻影響的言論，反倒是 1918 年 4 月，胡適先生發表於〈新青年〉：「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的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所以如果只是由時間的早晚這般形式上的判斷，恐怕無從理整出國語在現代文學發展中的實況。例如：周荐《漢語詞匯研究史綱》(p.13)言及：「……黎錦熙在 1916 年即倡導研究『國語』，並組織了中國國語研究會，提出兩大宗旨，一是規定標準語，推廣國語；二是言文一致，普及白話文。」顯然在胡氏之前，黎先生已有提倡國語的論調。

⑯ 和國語有關的文章約略還有：〈國語運動與文學〉、〈國語運動與國語教育〉、〈國語運動的歷史〉三文，俱作於 1921 年間（見參考書目 2）。

第二，這一種方言，在各種方言之中，產生的文學最多。……這兩種資格，缺了一種都不行。沒有文學的方言，無論通行如何遠，決不能代替已有文學的古文；這是不用說的了。但是若單有一點文學，不能行到遠地，那也是不行的。……我們現在提倡的國語是一種通行最廣最遠，又曾有一千年的文學的方言。因為他有這兩種資格，故大家久已公認他作中國語的唯一候選人，故全國人此時都公認他中國國語，推行出去，使他成爲全國學校教科書的用語，使他成爲全國報章雜誌的用語，使他成爲現代和將來的文學用語。這是建立國語的唯一方法。」

這段話則透露出，要能成爲「國語」的方言：(1)必須通行最廣。(2)產生的文學最多。這是國語形成的兩個基本條件。

3.另外在《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一書，引涉到民國七年的文學革命時說道：「這一年的文學革命，在建設方面，有兩件事可記。第一是白話詩的試驗。第二是歐洲新文學的提倡。北歐的 Ibsen Strindberg Anderson；東歐的 Dostojevski, Kuprin, Tolstoi；新希臘的 Ephtalotis；波蘭的 Seinkiewicz。這一年之中，介紹了這些人的文學進來，在這一方面，周作人的成績最好。他用的是直譯的方法。嚴格的盡量保全原文的文法與口氣。這種譯法，近年來很有人仿效。是國語歐化的一個起點。」

胡適認爲「直譯」西洋文學作品，是有不少人仿而效之的。並且亦能促使國語歐化。引文至此，可知胡先生乃是分三個方面談國語：

- (1)何謂國語？指出其和文學的關係。
- (2)文言、白話是國語滋長的養料。
- (3)由翻譯中造出歐化的國語。

就上頭所舉的三段資料，筆者以爲才是胡先生針對國語，真正具有影響力的看法。並可由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脈絡，得出可證的線索。

以下我們再由「國語歐化」、「國語在新文學運動中的發展路徑」，以及「歐化的影響」三部份，進行深一層的探索。

(一)「國語歐化」

相應於胡先生國語歐化的主張，傅斯年先生在〈怎樣做白話文〉中也說：「要是想成獨到的白話文，超於說話的白話文，有創造精神的白話文，與西洋文同流的白話文，還要在乞靈說話之外，再找出一宗高等憑藉物。這高等的憑藉物是什麼，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詞法、句法、章法……，一切修辭學上的方法。造成一種超於現在的國語，歐化的國語。因而成就一種歐化國語的文學。」^①

^① 《傅斯年選集》(文學)p.25，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年5月，初版。

傅先生所認定的白話文，是更進一步加以「直用」西洋文的各種形式，這已是完全歐化的看法。

依循傅先生的說法，筆者順水推舟地朝著「歐化國語」的方向，再進行盤繞巡視。認為所謂「歐化的國語」，和早期翻譯、清末的新民體間，有著頗為深厚的淵源^⑱（其實這當中仍舊有許多歷史成素存在著，需要再做更深入的分析）：

1. 胡適《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談道：

「十九世紀末年，翻譯的事業漸漸發達，……但當時的翻譯事業，並不甚廣。第一類是宗教的書，……第二類為科學和用科學的書，……第三類為史政治法制的書，……此外的書籍，如文學的書，如哲學的書，在當時還沒有人注意到，……嚴復與林紓的大功勞在於補救這兩個大缺陷。」

接著，胡氏並引了一段嚴復所譯的《群書肄言》中的文字，評述曰：「這種文字，以文章論，自然是古文的好作品；以內容論，又遠勝那無數『言之無物』的古文。怪不得嚴譯的書風行二十年了」。而言及林紓時，則胡氏又語：「林紓譯小仲馬的《茶花女》用古文敘事寫情，也可以算是一種新的嘗試。自有古文以來，從不會有這樣長篇的敘事寫情的文。……平心而論，林紓用古文做翻譯小說的試驗，總算是很有成績的了。」^⑲

此處所言，可以略為曉得文學的翻譯，還只停留在萌芽的階段。而林紓據以翻譯的語言，則是使用「古文」。

次者，亦有文學史家，提及文言翻譯。

2. 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

「與林紓同時翻譯西方思想學術名著有嚴復，時間稍後，用文言譯西方文學者，有蘇玄瑛（曼殊）之譯英詩，他還同陳獨秀合譯法國雨果的《悲慘世界》長篇小說。再其後，周樹人、周作人兄弟，曾譯過兩部《域外小說集》，也都用的是文言。」

再者，翻譯者本身對於文學作品所依據的語言，或者其翻譯的態度，也是值得我們多加以注意的。

⑱ 大陸學者趙豔芳於《國外語言學》(1996年第1期 p.42~47)介紹 Fedirico Masini〈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及向國語的進化〉。馬文探討 1840~1898 年白話文向國語的發展，是受到西方語言文化的影響。此論題方向，實當為本文所應詳加討論的部份。然而篇幅所限，筆者這一方面的資料又不足，俟待它日，再行增補。

⑲ 陳紀濤《百年來中國文藝的發展》之中也言：「林琴南譯的這些書，有的出版於光緒末年，有的出版於民國十年以前。」（臺北，重光出版社，再版，1978年3月，p.42。）

3. 魏紹昌《晚清四大小說家》：

「晚清風行一時的編譯小說，……編譯者本人不一定懂外文，或由他人口述，或據他人譯本編寫。」

另外，當時文人，對於這段清末到民初的語文的發展，亦提出一些見解與看法，譬如：

4.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

「啓超夙不喜桐城古文，幼年爲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練。至是自解放，務爲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民體。老輩則詆爲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這不僅是梁氏自述，時代稍後的學者，對此亦進行了補充。

(1) 胡適則說：「梁啓超，當他辦《新民叢報》時，已是一個很有力的政論家。後來他辦《新民叢報》影響更大。二十年來的讀書人，差不多沒有不受他的文章的影響的。」^{②0}

(2) 朱光潛在《現代中國文學》中，亦言：

「梁啓超的《新民叢報》，林紓的翻譯小說，嚴復的翻譯學術，章士釗的政論文以及白話文未流行以前底一般學術文與政論……。他們還是應用文，卻已打破古文的諸多拘束，往往盡情流露，酣暢淋漓，容易引人入勝。我們年在五十年左右底人大半都還記得幼時新民叢報底熱忱與快感。這種過渡期的新文言對於沒落期的古文已經是一個大解放，進一步底解釋所要做底事不過把文言換成白話而已。」^{②1}

以上四點，除了傳達出，由清末從事文言翻譯的工作，到文人辦報所成造出的影響

^{②0}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臺北，遠流出版社，1986年第1版，p.88。

^{②1} 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臺北，駱駝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p.18。關於「嚴復的翻譯藝術」，則有學者由翻譯所帶入的不同思想，對漢語所造成的影響，進一步討論胡適於四十自述中說明嚴復〈天演論〉在當時的影響。如：蘇光文、胡國強所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册）說到：「……這表明一種新學說、新思想已開始從理論形態走向世俗形態，並走進人們的日常生活……這意謂著知識從本源語言進入譯體語言時，不可避免地要在譯體語言的歷史環境中，生發出新的意義。維特根斯坦有句名言：『語言的意義就是用法』，可謂一語中的。語言意義始終生成于它所處的現實與句法構成的語境之中。」可以見得關於翻譯上的諸多問題的研究，仍有待於繼續努力。（《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卷），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力外，也可以約略得知這些翻譯的文體，是為大眾所接受的。然而最重要的，莫過於這些歷史的陳述，都在反應出，胡、傅兩位先生提出歐化國語的依據，及其背景。

(二)「國語」在新文學運動發展中的路徑

總的來說，由上面所徵引的史料，可以看出國語不但吸收文言、白話，而且也在翻譯作品中尋求歐化。並由早期文言的翻譯，導入所謂白話新文學的翻譯浪潮中。讓國語持續滋長。從這個角度，我們再從《中國新文學大系·第十集》，關於1917~1927年所收的歷史資料加以仔細思索。

筆者歸結如下：

1. 當時從事現代文藝創作或理論者多兼翻譯，約略有：王魯彥、李劫人、李秉之、李霽野、李青崖、沈澤民、汪馥泉、林語堂、周作人、徐調孚、夏丏尊、梁遇春、徐志摩、陳望道、梁實秋、傅東華、郭沫若、趙景深、劉復、鄭振鐸、魯迅、蔣光慈、謝六逸……些先生們的文章、書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亦都占有相當的份量。

2. 翻譯的作品，來自世界各地，計有：日本、印度、波斯、俄國、猶太、瑞典、波蘭、挪威、丹麥、德國、匈牙利、法國、荷蘭、比利時、英國、南非等。看得出並沒有限定於歐洲文學。也就是國語於此時，已不單純是「歐化」、抑或是「英化」（關於這兩個問題，容後討論），實際情況可能是比較複雜的。

這些文人兼翻譯者（同時也可能是文學革命推行者）的作品，也多登錄在當時出版的主要雜誌上，或是本人即為雜誌之編輯。如：陳獨秀主編《新青年》，1915年創刊。傅斯年、羅家倫負責編輯，由北京大學新潮社編的《新潮》，1919年創刊。還有創刊於清宣統二年，1921年革新而登載新文學作品的《小說月報》……等等。

4. 除此之外，也還有一些社團的參與及推動。如文學研究會、創造社、新月社、語絲等。

另一方面，我們還必須了解到，在胡先生提舉「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後，政治力量的介入，亦即語音的統一，「國語」方才成為一容易學習的語言系統。在這個因素輔助下，國語的推動，獲得了有力的支助。如：(1)民國二年，「教育部讀音統一會」正式成立。(2)民國七年，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七年十二月，公布「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規程」十四條。(3)次年四月「國語統一籌備會」正式成立，由錢玄同、汪怡、黎錦熙，將吳敬恆所編的《國音字典》詳加修訂。(4)民國九年，教育部正式公布，以之為國語之標準。(5)民國十九年，國民政府改稱「注音字母」為「注音符號」。(6)民國二十年，重修《國音字典》，改編為《國音常用字彙》由教育部公佈。(7)民國二十四年，成立「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由吳敬恆主持，委員有錢玄同、黎錦熙、汪怡、魏建功、蔡元培、趙元任、林語堂、顧頡剛、胡適等人。(8)民國二十九年，準照國音，編定

《中華新韻》，次年由國民政府公佈。(9)民國三十五年，「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成立。^②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語音的骨架是逐漸確立起來了。但是構成國語的血肉，亦即「文學的國語」，卻因為大夥兒的注意力，轉向集中於文學發展而受到了嚴重的漠視。

長久下來，由於人們的目光多投注在現代的文學理論和文藝創作方面，走向胡適所謂國語的文學路線上，對於不斷由新文學中吸取養分，逐步壯大的「國語」，也就習焉而不察了。「國語」的成份之所以不明，跟長期以來只注意「國語的文學」，而輕忽了「文學的國語」，實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

綜觀上述，就整個歷史背景的發展看來，胡適所標舉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口號，除了帶動整個國語的發展外，新文學運動順利展開，也很快地獲得了成功。

關於這一點，司馬長風這麼說道：「自一九一七年一月發難，到一九二〇年一月獲得全面勝利，首尾三年，幾乎沒有遭多大抵抗。……所以沒有遭受多大抵抗，並非說保守派不想抵抗，而是文學革命進展太快，他們來不及有組織的反抗和反擊，已經被打倒了。進展所以這樣快，因為趕上了五四運動(1919)的浪頭，五四運動不但擊敗了北洋政府，挫折了日本侵略，並且動搖和瓦解了中國的傳統，以及附著在傳統上的一切舊東西——古文只是其中之一。」^③司馬氏所言，其實又牽扯出當時政治、社會對文學革命的反應，不過就國語裡頭的成份而言，「古文」並沒有因此而瓦解、消失。(即使在目前我們所使用的口頭語、書面語中，仍扮演著相當重要的地位。)

還有一點值得附帶說明。三十年代期間，也曾出現過「漢字拉丁化」以及「大眾語」運動。前者的發生「據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一書中指稱：最先提『拉丁化』的，是張庚、葉籟士和岡林。而對此一運動用力尤多，並出具體意見的，則為葉籟士。他除了批評民國十五年和民國十七年國語統一籌備會公佈的『注音符號』和『國語羅馬字』以北平話為中心，結果弄得『非驢非馬』之外，並且舉出了蘇聯華僑創製『拉丁化中文』的優點。」^④

後者有：宋陽(瞿秋白)〈大眾文藝的問題〉，1932年，文學月報創刊號。止敬(矛盾)〈問題中的大眾文藝〉，1932年，文學月報，第1卷第2號……。關於這方面的資料還有不少，篇幅所限，這兒就不多舉了^⑤。倒是李牧《三十年代文藝論》中對這段過程，

② 參陳新雄先生等編著：《語言學辭典》。

③ 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臺北，駱駝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p.65。

④ 李牧：《三十年代文藝論》，臺北，黎明文化事業，1973年6月出版，p.90~94。

⑤ 如：周起應(周揚)〈關於文學大眾化〉，1932年，《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宋陽(瞿秋白)〈再論大眾文藝答止敬〉，1932年，《文學月報》，第1卷第3號。常庚(魯迅)〈論舊形式的採用〉，1934年5月4日，〈中華日報副刊·動向〉。陳子展

說道：「……當時的教育未能普及，國語注音符號也未能確立，加以中國的版圖廣大、人口衆多、方言與土語複雜，致使此一『大衆語』『拉丁化』運動逞強一時，也爲不可否認的另一原因。」²⁶李氏所言，或可備爲一說。可知三十年代的語文運動，也是國語發展中的重要階段。

談到這裡，我們也可以曉得國語在新文學運動進展過程中，事實上，仍有諸多語文論戰參雜其間。

(三)歐化的影響

申論至此，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需要再仔細的探討。即是有關前文所言「歐化」、「英化」的問題。同時，在這個中所衍生的疑惑，亦爲筆者所關切的重要課題。

在過去，也有學者由歐化、英化的角度，對現代漢語做觀察。在本文裡，筆者由現代文學史料的方向，認爲現代漢語外來語的研究應當不侷限在這兩方面(儘管它們的比例高，而這些數字能否具有決定性的標準?都將是今後必然要面對的問題)，再來仍有幾個問題是得繼續思考的：(1)過去學者曾將外來語作分期處理，筆者的疑問是，這些不同時期所引入的外來語，對漢語詞彙、語法呈現出什麼樣的影響?(譬如：這之間是否因翻譯上的問題?抑或是歷史、文化層面的因素?而有著不同的處理態度。又如不同的時代，處理外來語的方法，同異情形又是如何?)²⁷ (2)能否藉由現代語言學之中，不同的學科方法(譬如說：心理語言學、社會語言學等等)對外來語的發展做更深入的思索。如依上述兩點分別由內部、外部，來做探測的工作，相信對於外來語的研究，或是整個漢語語言學的研究來說，都會有所幫助。

同樣的，仍分成幾點來進行初步的檢討：

〈文言——白話——大衆語〉，1934年6月18日，〈申報副刊·自由談〉。陳望道〈關於大衆語文學的建設〉，1934年6月19日，〈申報副刊·自由談〉。胡愈之〈關於大衆語文〉，1934年6月23日，〈申報副刊·自由談〉。葉聖陶〈雜談讀書作文和大衆語文學〉，1934年6月24日，〈申報副刊·自由談〉。何容〈論大衆語〉，1934年，《人間世》，第10期。史鐵兒(瞿秋白)〈普洛大衆文藝的現實問題〉，1932年，《文學》第1卷第1期。……等等。

²⁶ 同註²⁴。

²⁷ 譬如：高名凱、劉正琰曾就漢語外來語的來源和時代作出分類。讀者或可參考姚榮松：〈外來語——廉價的朱古力?或入超的舶來品?〉，臺北，《國文天地》雜誌，7卷6期，1991年11月，以及潘文國等著：《漢語的構詞法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93年2月，初版。

1. 顧百里先生《白話文歐化語法之研究》(A Study of Europeanized Grammar in Written Chinese)²⁸，針對「歐化」的原因，筆者將其所論歸納成四點：

(1) A large number of the best known modern Chinese writers, including such literary giants as Ba Jin, Lu Xun, Mao Dun, Hu Shi, and Guo Moruo, began their careers as translators of western literature. Having read translated many foreign works, they were naturally influenced by them and, already accustomed to a Europeanized style in their translations, they soon began introducing foreign grammatical elements into their original compositions. Generally, as the body of the translations and new—style original works increased, there appeared a generation of avid, young Chinese readers who, although themselves knowing no foreign language or only very little, would nonetheless imitate foreign structures in their own writing. In this way, Europeanized grammar moved from a tenuous existence in translations to an independent and productive life in original Chinese works.

(2) There were several other reasons for the rapid spread of Europeanized Chinese in the first few decades of this century. One of these was the great increase in publishing which occurred during the same period.

(3) Not only books but also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of every description were printed increasing numbers in the period immediately after May Fourth.

(4) Another important source of foreign language influence, discussed by Xia Ji an(1957 : 69), was the English classroom in Chinese Schools.

顧氏認為國語的歐化有四個因素：(1)昔時文學界的巨人(如巴金、魯迅、胡適、郭沫若等)習於外文的思考結構，透過翻譯的工作，使得歐化的語法潛移默化地深入中文的文學作品，而年輕的讀者無形中，也會在其寫作時有所模仿。(2)出版事業的擴充。(3)書報雜誌的增加。(4)學校教授英文。在上引幾點見解中，(1)的看法是筆者相當重視，並且是十分重要的。而“Europeanized grammar moved from a tenuous existence in translations to an independent and productive life in original Chinese works.”更是一關鍵語。

就此論點，呂正惠〈西方文學翻譯在臺灣〉也說道：「……西方文學的介紹與翻譯，在新文學形成期的重要性；翻譯的作品愈多，新文學作家所憑藉以學習、成長的資源就越豐富。」

²⁸ 臺北，學生書局，1985年11月，初版。

然而早期學者針對歐化現象則有著不同的看法，譬如：

(1)林語堂《論翻譯》：「……歐化之大部份工作在於詞彙，若語法乃極不易歐化，而且不能句句歐化也。」²⁹

(2)出版於四十年代末期——王力《中國現代語法》：「咱們對於歐化的語法，應該有兩種認識。第一，它往往只在文章上出現，還不大看見它在口語裡出現，所以多數歐化的語法只是文法上的歐化，不是語法上的歐化。第二，只有知識社會用慣了它，一般民衆並沒有習慣。」³⁰

若再對照筆者於前面所搜集的史料相較林、王兩先生的說法，這之間的歧異，是需要更深層的研究。

2.關於曹逢甫「英化」現象的討論，見於其文〈過去兩百年漢語詞法語句法的英化〉³¹。該文主從王力先生的研究，繼續做發展，並揀擇了一些流行於大眾的文學作品，做為其分析的語料。不過因為前提已限定在「英化」的過程中的詞法、句法，且其撰文的時間亦早。所以發現的語言現象，僅能做為我們日後研究現代漢語外來語的重要參考資料。

至於筆者由現代文學史中，所留意到的早期翻譯不同國家的文學作品(亦即歐美以外)，其中詞法、句法以及語音的演變、發展，是如何對國語生成產生影響的具體脈絡？都是值得繼續探索的課題。

綜合 1、2 兩點，我們如從文學起源——模仿衝動說(Imitative Impulse Theory)：「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以為人生來就具有模仿之本能，一切藝術創作皆是模仿本能的表現」³²來談。在這樣的基礎上，人類先天對語言組織、創造以及文學模仿的能力看來，在國語發生的過程中，翻譯文學占有重要的地位。當人們沉浸於文學作品時，也正在模擬著作者的語言形式。日積月累的結果，文學的國語在翻譯的作品的洪流下，著實吸收了不少外來的成份。這是不容置疑的。而這些外來的成份(包括歐化句法、構詞等)，並非處於單純狀態。可能和文言、白話或者方言語法間，彼此雜揉於大眾的語言思考結構中。³³

²⁹ 見林氏《語言學論叢》，臺北，文星書局，1967年5月，臺1版。

³⁰ 王力：《中國現代語法》，大陸，新華書店，1985年6月，新1版。

³¹ 曹逢甫：《應用語言學的探索》，臺北，文鶴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p.285~300。

³² 參見張健：《文學概論》，臺北，五南圖書文化公司。

³³ 卡爾文《大腦如何思考》談道：「……(1)人類大腦具有一個語言模組，位於大部份人類的左上方，而通用文法可能在人類出生時就根植其中。……(2)語法似乎就

總括前文，若要將這種種混沌的語言現象作進一步的研究，筆者認為必須繼續往三個方向，做整合性的思考：

1. 方言研究方面

近年來，海峽兩岸許多學者，有不少相關的討論。譬如：

(1)鄭良偉(1991)探討臺灣的語言發展現象，不但對舉國語、臺語彼此在構詞法中相互影響的例證，並由書面語、口頭語的角度來看待現代小說中的詞法問題。透過這一層比較，也讓我們了解到「國語」研究上複雜度，進而探索不同的研究空間。^{③④}

(2)蔣紹愚(1994)也提到大陸學者對近代漢語的文學作品，個中方言成份的研究。文中雖然只列舉西遊記、金瓶梅、紅樓夢三部白話小說，而且目的是放在對作者的考證上，倒也透露學者們對這一方面研究的重視。這一點亦值得我們仔細思索。^{③⑤}

(3)施其生(1996)〈方言區語法差誤成因探討〉一文，比較了廣州話、汕頭話和大陸上普通話(即其共同語)在語法上的不同，其文另就不同的學習層級做討論。從廣義的層面來說，這一個思考的角度，將有助於釐整出不同方言和國語之間的關係。^{③⑥}

以上是與國語較為相關的方言研究。而大陸地區，在整個方言研究的各方面上，近些年則有著相當豐富的成果。相關內容，篇幅所限，於此不再贅述^{③⑦}。

是架構心智模型的東西。這個模型牽涉到誰對誰做了什麼事、為什麼、什麼時候，以及什麼方法等等。至少，當你傳達精密的理解過程時，你必須把相對關係的心智模型，翻譯成語言的心智文法，然後以適當的文序及詞性，幫助聽者重建你的心智模型。……我們可以預期，語法擴增產生的作用，將導致臆測智能大幅增進。」臺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p.109~111，1997年11月，第1版。卡氏的說法能否運用於第二外國語的學習研究，是另外一個問題。只是這裡所發現人類語言的模組中，會因為學習、思考語法，而使得臆測智能大幅增進。雖只是預期，然此推論的成立與否，將是心理語言學家，必須坦然面對的課題。

- ③④ 鄭良偉：〈主流派的融合與互動——從臺灣當代小說的詞法看漢語語法的演變〉，臺北，《國文天地》。
- ③⑤ 參見其書：《近代漢語研究概況》，大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
- ③⑥ 參見其書《方言論稿》，p.120~142。
- ③⑦ 參見許嘉璐等著：《中國語言學現狀與展望》，大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p.162~189。

2. 社會語言學、心理語言學

在這一方面，筆者掌握到的資料，大多是敘述外國研究的成果(至於漢語研究者的成績做得比較少)。倒是有許多的觀點，是相當值得仔細思考的。例如：

社會學語言學家 William Labov(1969)說：「...the social situation is the most powerful determinant of verbal behavior.」(社會情況是說話行為最有力的決定因素。³⁸)以拉波夫所言來考量國語的問題時，我們可以發現到單由語言理論推衍而得的結果，實際上仍存在著許多有待思考的難題(即如：社會、個人等等因素)。可是如何由拉氏提出的想法進階思考，恐怕也有其本身的困難，(拉氏的說法似乎是僅定位在口頭語的層面。³⁹)譬如說：如果我們分析中國現代文學史料，最多也只能做到書面語的程度，至於如何透過口頭語的研究與書面語做比較?口頭語方面又該如何拿捏?或應循哪種方向探索?都必須要再加以考量。

至於心理語言學上的研究，學者如：靳洪剛也談過：「人們對第二語言獲得的研究，僅僅是開端而已。有很多問題，仍然是謎，還有待其它的測試去進行，再檢驗、再探討。」⁴⁰又說：「事實上，第二語言獲得的研究，早已擴大到語用、話語層次，而且更重要的發展是第二語言獲得的研究，不但注重語言的交際形式，更重視語言的交際功能。這方面的研究，正在進行之中，期望對第二語言的獲得研究，有重大的突破性貢獻。⁴¹」就靳先生所言，我們除了期待心理語言學家有所突破外，如果借助這方面的研究來解析國語中的外來語成份，相信對於漢語語言現象，會有更深層的掌握。

三、結 語

本文主要提出胡適之先生「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對於國語生成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並由三個層面來探討國語是如何形成的問題。(一)「國語的歐化」：藉由清末翻譯與新民體的提倡，說明國語是在當時代學術背景的思潮中孕育而成，而胡適、傅斯年等先生對歐化的提倡，則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力。(二)國語在新文學發展的路徑」：經由中

³⁸ 轉引自謝國平：《語言學概論》，臺北，三民書局，1996年8月，8版，p.260。

³⁹ 譬如說拉氏調查紐約市居民的語音、或是運用許多語言研究分析的成果，來幫助法官斷案等等。基於這方面的資料，筆者亦正在摸索，故不能詳論。

⁴⁰ 靳洪剛：《語言發展心理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4年8月，初版，p.233。

⁴¹ 同註⁴⁰，p.259。

國新文學大系所蒐羅的資料，發現當時的翻譯作品不僅有歐美地區的文學，其中所觸及的地區範圍以及牽涉的語言可能是更廣的。(三)「歐化的影響」：在(一)(二)兩點的討論中，促使我們進一步去思考現代漢語詞彙、語法應當對於這些「外來的成分」，做更深入的探討^{④②}。百年來，外來文化不斷地湧進。在學術的大環境裡，任何一個學科，如果研究目標漂浮無根，實在是難脫套用之途。正因為如此，探討國語的語言成份，對整個現代漢語語言研究而言，著實重要。費迪南·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普通語言學教程》曾說道：「語言學唯一的，真正的對象是在語言自身之中研究語言。^{④③}」(The true and unique object of linguistics is language studied in and for itself.)^{④④}。這是相當具有啟發性的說法。

(本文作者為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④② 這裡必須加以說明的是，誠然外來詞彙、語法與漢語接觸後，與漢語本身規律不相容者會被淘汰，不過我的看法是現代漢語「語言接觸」的研究，不單是如英語Pidgin(洋涇濱)、Creol(克里奧語)兩個層面的思考，我們應該進一步去追問「不同語言接觸時」的刺激與影響，使得我們進一步思考「文化接觸」的課題。

④③ 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5年10月，初版。p.322。

④④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臺北，書林出版社，p.232。

參 考 書 目

1.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5月，初版。
2. 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語言文字研究》，大陸，中華書局，1993年10月，第1版。
3.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臺北，遠流出版社，1986年第1版。
4. 李牧：《三十年代文藝論》，臺北，黎明文化事業，1973年6月出版。
5. 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臺北，駱駝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
6. 朱兆祥：《漢語論叢》，新加坡南洋大學語言中心，1971年，耶魯出版社，初版。
7. 張博宇：《臺灣地區國語運動史料——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國語文教育研討會資料》，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11月，初版。
8. 黃宣範：〈臺灣社會語言學的一些觀察〉，臺北，《國文天地》雜誌，7卷6期，1991年11月。
9. 姚榮松：〈外來語——廉價的朱古力?或入超的舶來品?〉，臺北，《國文天地》雜誌，7卷6期，1991年11月。
10. 羅肇錦：〈臺灣語言的過去、現在、未來〉，臺北，《國文天地》雜誌，7卷6期。
11. 曹逢甫：〈標準國語的重新釐定此其時矣〉，臺北，《國文天地》雜誌，7卷6期，1991年11月。
12. 鄭良偉：〈主流派的融合與互動——從臺灣當代小說的詞法看漢語語法的演變〉，臺北，《國文天地》。
13. 湯廷池：《國語語法研究論集》，臺北，學生書局，1996年10月，初版5刷。
14. 羅肇錦：《國語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2年6月，2版。
15. 魏岫明：《國語演變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4年6月出版。
16. 靳洪剛：《語言發展心理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4年8月，初版。
17. 黃宣範：《語言學論叢》，臺北，黎明出版社，1974年。
18. 潘文國等著：《漢語的構詞法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93年2月，出版。
19. 曹逢甫：《應用語言學的探索》，臺北，文鶴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
20.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臺北，書林出版社。
21.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1月，臺2版。
22. 謝國平：《語言學概論》，臺北，三民書局，1996年8月，8版。
23. 周荐：《漢語詞匯研究史綱》，大陸，語文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
24. 詹伯慧：〈漢語方言研究的回顧和前瞻〉，《語言文字學》，1992年3月，p. 141。

25. 賀巍：〈漢語方言語法研究的幾個問題〉，《語言文字學》，1992年10月，p.134。
 26. 許嘉璐等著：《中國語言學現狀與展望》，大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27. 《五四文學與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局，1990年4月出版。
 28. 方祖燊、鄭奮鵬、張孝裕：〈六十年來國語運動史〉，見程發軔《六十年來之國學(二) 語言文字學》，臺北，正中書局，1976年，p.461~554。
-

